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素以“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而闻名。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地处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交汇地带,境内人群杂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既发现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亦有较多中原式铜器出土。2019年,固原隆德博物馆征集到了一批据介绍为固原本地出土的东周时期中原式青铜兵器,以往较为少见。考虑到这批青铜兵器对研究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现将其公布于学界。

形制

这批青铜兵器共5件,包括戈、剑两类。

铜戈

共4件,均为直内有胡戈。长条援上扬,援本上端一穿;中胡,胡上两穿;长方内无刃,内上一穿。根据援部差异,可分二型。

A型3件。援身前窄后宽,前锋呈弧形尖削,横截面呈菱形,三面刃。Z0608(馆藏号,下同)(图1),通长16.7厘米,弦长9.0厘米,重100克。胡上三穿,上穿微斜,呈不规则则扁方形,其下两穿为长条形,阑长出胡端。内长方形,内与援在一条直线上,内上一长条形穿,内角圆钝。Z2485(图2),通长10.0厘米,通宽10.0厘米,通高0.4厘米,重190克。胡上三穿,上穿呈扁方形,其下两穿为不规整长条形。阑长出胡端。内较平直,长方形,内上一长条形穿,内角圆钝。Z2486(图3),通长18.0厘米,通宽10.0厘米,通高0.4厘米,重170克。胡上三穿,上穿微斜,呈不规则则扁方形,其下两穿为长条形。阑长出胡端。内长方形,微上扬,内上一长条形穿,内角圆钝。

B型1件。援身前前后基本等宽,前锋呈弧形,脊突起,横截面呈菱形,三面刃。Z2484(图4),通长18.0厘米,通宽9.0厘米,通高0.4厘米,重160克。胡上三椭圆形穿,阑长出胡端,内与阑呈直角状。内为平直长方形,下角做出缺口,内上一长条形穿。

铜剑

1件。Z2555(图5),通长30.0厘米,通宽4.0厘米,重200克。扁长茎,横截面呈长方形,茎侧有一小齿。宽条形格,剑身似柳叶形,横截面呈菱形,无血槽。

年代

这5件青铜兵器系征集品,无出土信息及共存关系。我们通过对比以往考古发现的同类器,初步推断它们的年代。

隆德县博物馆藏铜戈均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常见形制。A型铜戈Z0608、Z2485、Z2486与固原彭堡撒门村M3出土的铜戈(图6-1)形制相似,亦与太原金胜村M251:645(图6-3)形制相近,杨建华先生认为彭堡撒门村M3这件铜戈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目前学界普



图1 Z0608



图2 Z2485



图3 Z2486



图4 Z2484



图5 Z2555

陈佩佩 夏福德 魏存喜

宁夏隆德县博物馆藏几件中原式青铜兵器考略

遍认为太原金胜村M251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下限进入战国早期早段,因此A型铜戈的年代定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大致无误。B型铜戈Z2484与固原杨郎马庄IM1出土的铜戈形制相近(图6-2),亦与太原金胜村M251:596(图6-4)形制风格基本一致,固原杨郎马庄M1出土物中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遗物,太原金胜村M251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下限进入战国早期早段,因此B型铜戈的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

因此隆德这几件铜戈的年代应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

隆德县博物馆藏的这件柄身复合式扁茎柳叶形剑,折肩、有格,属于典型的中原东周式铜剑风格,与北方系青铜短剑区别较大。隆德Z2555总体形制与邢台葛家庄M10:114(图7-1)和凤翔八旗屯CM9出土的铜剑(图7-2)较为接近。邢台葛家庄M10:114剑格为木质,已朽,邢台葛家庄M10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不过隆德Z2555的柳叶形剑身相较中原地区的短剑略短,与北方系青铜短剑的剑身风格却有相似之处,不排除是受到了北方系青铜短剑的影响。

柄身复合式扁茎剑的柄装迄今未发现完整实物,只能推测其装柄方式。《考工记》郑玄注曰:“茎,在夹中者。”20世纪70年代在宝鸡茹家庄一座西周中期墓(BK1M1乙)中出土一件带有木柄的铜剑,柄上裹有丝绳,说明柄、身复合的铜剑应是在扁茎两面夹装木柄,通过茎上的穿孔钉固,再用丝绳或麻绳缠绕。茎上无穿孔的剑,可能是利用胶粘或缠绳来固连木柄。隆德县这件扁茎剑茎侧的小突齿,应与装夹加固有关。剑格为分铸,于茎、身交接处套装。一些剑出土时剑格已失或朽无,并非没有。

通过前文的对比可知,隆德博物馆藏的这几件中原式兵器年代应该在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

结语

固原地处北方长城地带的西端,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区。根据罗丰先生的考证,战国时期这里生活的主要为西戎八国中的乌氏戎和义渠戎。不过以往这些戎人墓葬中也出土了较多的中原式铜兵器,尤其是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铜戈,如于家庄墓地、杨郎马庄墓地、彭堡撒门村墓地等。这些铜戈从形制上看均作弧线形锋,中长胡二穿,援上扬,有宽窄之分,长方形内既有长短之分,也有无刃与出刃之别,均具有战国时期中原戈的显著特征,表明它们应来自中原地区。固原地区的戎族与秦、三晋地区来往密切,这些中原式铜兵器可能通过战争、贸易、赏赐等方式流入固原,并中伟等先生对固原彭阳红河乡征集的有铭戈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隆德县博物馆此次征集的5件青铜兵器均为中原系铜武器,从以往固原出土的同类器来看,出自本地的可能性较大。这批铜兵器展现了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传播和影响,见证了战国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探讨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甘宁地区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整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4CKG018)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第二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第三作者单位:宁夏隆德县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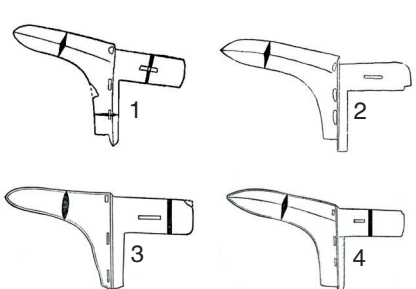


图6 铜戈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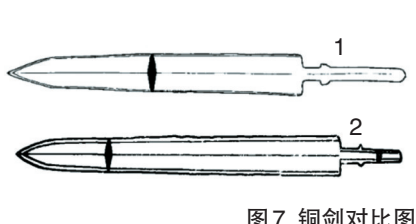


图7 铜剑对比图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新征集传统航海罗盘探微

李东风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指南针又称罗盘、罗经、罗针盘、罗庚、针盘等。早在北宋时期,指南针已作为船舶导航设备应用于航海。指南针既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突出标志,又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23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卢家炳家中征集到一批更路簿、木质航海罗盘、海图、家谱等涉海文物藏品。其中征集到的航海罗盘有明确的使用者,传承有序,对研究航海罗盘的形制、使用方法等具有重要价值。

卢氏航海家族

卢家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琼海市市级传承人,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南春节习俗(鲤鱼灯闹春)”传承人,其家所在的潭门镇草塘村村委会上教村是一个位于南海北部、海南岛东部的滨海渔村,村民多在附近海域从事“做海”活动。

与航海罗盘一同征集的文物藏品还有一本卢氏家谱,封面题“光绪十年立年生簿(簿)”,册子长12厘米、宽11厘米、厚0.4厘米,含封面和封底共36页。记载了自卢元觉起的直系谱系,其直系后代辈分依次是大、有、修、鸿、业、家。据记载,卢元觉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葬于沙牛埗坡。其后代中写明葬址的有西排坡、沙沟坡、林祠坡、北截墩、西坡园、北截村园、北截坡、新村园、草塘坡等,均为滨海地区。故推断卢氏家族是一个至少从乾隆年间就已经居住生活于琼海滨海村落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世家。潭门镇沿海村庄与卢氏家族类似的家族还有很多,如王氏、苏氏等,都是比较大的渔民家族群体。

据卢家炳介绍,其曾祖父卢修福、祖父卢鸿保、父亲卢业发均当过船长。他们数百年来持续不断地与其他渔民一起,共同驾驶木帆船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站时行盘”,开发利用南海岛礁及其相关海域。该航海罗盘和更路簿系其父卢业发及其祖辈使用并传承下来的。据夏代云等对卢业发的访谈,他已记不清楚该罗盘的具体年代,但认为该罗盘至少在距今100多年前。卢家炳回忆,在其小时候,家里还有七八个同类型的木质航海罗盘。随着时代变迁,西式磁罗经、航海图、机船、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等设备逐步推广使用,承载着灿烂海上传奇的更路簿和传统木质航海罗盘逐渐成为历史。卢家炳家中的木质航海罗盘,也因房屋搬迁等原因,或送人、或丢弃、或遗失,仅剩一只。

航海罗盘形制

这件航海罗盘分为两部分,上部为盖,下部为盘,子母口(图1)。均由“海棠木”整体刨制而成,木质紧密,纹理美观,外表涂刷桐油,呈暗黄色。盖侧面和盘侧面各有一个墨书苏州码子“圭父”,转为阿拉伯数字是“89”。苏州码子在明清至民国初期民间应用颇为广泛,常用于计数、记账、标价等。因罗盘上的苏州码子未写明单位,夏代云猜测可能表示是89文铜钱,但89文钱的价值较小,且将价格用毛笔

何绍基堪称颜真卿书法的忠实且坚定的追随者。他广涉北碑,将金石碑版的古朴厚重融入笔墨之间,于颜体书法之精髓深研细悟,既扎根于颜体之深厚土壤,又能在融会贯通中推陈出新,自成一派风貌。其楷书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神韵,无论是结体的方整中见圆浑、稳重里寓灵动,还是笔意的爽利干净、斩钉截铁,皆可见对颜体的承袭与化用。

何绍基所书的《何凌汉碑》中记载,何氏一族源远流长,其先世于南宋时期,自山东青州益都辗转南渡,最终在湖南道州东门村这片土地上落脚生根,靠着辛勤打短工、卖苦力,以勤劳质朴之姿在永州大地稳稳立足。

何绍基之父何凌汉,才学卓绝,官至户部尚书,在书法、教育、学术、藏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尤对颜真卿书风钟爱有加。在这样浓厚的家学氛围熏陶下,何绍基自幼便深受影响,踏上了研习颜真卿书法的漫漫征途。

而永州道县附近,镌刻于祁阳浯溪湘江岸崖之上的《大唐中兴颂》,宛如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为何绍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习条件。自幼年起,他便得以时常瞻仰这雄浑壮阔的碑刻,那磅礴的气势、巍峨的雄姿,如春风化雨般,悄然浸润着他的心灵。何绍基多次探访浯溪摩崖(中兴碑),诗文中多有记载,还曾冒雪手拓。正是何绍基对《中兴碑》这般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研学,才为他的书法艺术攀登高峰、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无比的基础。《中兴碑》纵422.3厘米,横416.6厘米,计21行,每行20字,共计332字,楷书,字径在15厘米左右,是颜书传世作品中字迹最大者。此碑内容为“记平安史之乱,颂大唐中兴之事”。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云:“此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对何绍基所书的《何凌汉神道碑》《何凌汉碑》以及颜真卿书写的《中兴颂》《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的字迹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何绍基无论是对字的整体结构把控还是细节笔画的处理上,都几乎与颜真卿书写的如出一辙。

何绍基从《中兴碑》等颜真卿作品中汲取了充足养分。他的许多传世作品中,都不乏能见到对颜真卿书风的传习和自我革新。

何绍基早期书风就像是深入骨髓地传承了“颜筋”,不仅是结体方正规整、线条饱满浑厚,还体现在一笔一画,如横画起笔和收笔重顿,而行笔中段提细;转折处以重顿提升线条的立体感;捺画收笔处先重顿再摆动笔锋出尖等等,充分表达筋力丰润的笔锋走势。

笔“明码标价”于罗盘之上,并不符合商人利益。该数字应是罗盘作坊或商肆给罗盘编的号码。以前罗盘均为手工制作,各罗盘盖与盖之间尺寸可能有细微差别,一般不通用。盖与盘均书写同一数字,是罗盘盖与盘相合的标记,避免与其他罗盘部件混淆。

罗盘盖高2厘米,盖面阴刻双圈纹,中部有墨书汉字,多数已经弥漫不清,有5竖行,每竖行各有4个字,竖行上另有一横排字。能够识别的字,从右往左第一竖行有“行”,第二竖行有“可近”,第三竖行字体稍大,较为清晰,为“蔡琨记造”四字,是罗盘作坊名。第四、第五竖行和横排文字难以识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原广东省琼海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渔民捐赠的航海罗盘(图2),与此罗盘为同一作坊生产,盖面文字较为清晰,内容为罗盘商号和“使用须知”,从右往左竖行文字分别为“开盘行船不可近铁 蔡琨记造 针端指北 义端指南”,横排为两格各三字,右边格中文字为“广州湾”,左边格中文字为“西华”,第二字较为模糊,难以识别。故此可以判断,卢家炳家传航海罗盘的产地应为“广州湾”,即今广东省湛江市。至于是渔民直接购置于湛江,还是由商家转卖到琼海潭门,目前还难以判断。

罗盘盘高4厘米,呈圆柱形,底部略凹,底部直径8厘米,盘面直径约9.5厘米。盘面中部下刻深槽,为装置磁针的圆形“天池”,直径约5厘米,深约2厘米。“天池”底和壁均刷以白色石灰。“天池”正中立有一根铜制支轴(轴针),其尖端顶在镶嵌于铁质针中部的六边形铜顶帽上,有利于减少磁针与轴针之间的摩擦,便于磁针平衡旋转,提高磁针的精确性。磁针大体呈箭形,长度略小于“天池”直径,通长约4厘米,最宽处约0.7厘米。航海罗盘磁针样式与堪舆罗盘磁针样式明显不同,堪舆罗盘磁针通常为一根细长的铁丝,一端涂红色,另一端涂黑色,红头指向南方,黑头指向北方。该航海罗盘磁针之上有一圆形玻璃片盖住“天池”,以保护“天池”,同时也避免罗盘晃动时磁针从轴针上滑落。玻璃片上粘有一圈细铜丝,直径约0.1厘米,以固定玻璃片。“天池”口外圈为方位圈,涂以黑漆,宽约2厘米,阴刻二十四山以指示方位,各相邻格之间均阴刻一道直线,阴刻的线 with 字均以白色石灰填充。堪舆罗盘的盘面则复杂得多,除了书刻二十四山,盘面还有书刻阴阳八卦、九星、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在“天池”口还有一根细铜丝表示“子午线”,其两端分别插入方位圈“子”格和“午”格的中分线靠近天池的一端,此线是确定二十四山方位的主要依据。使用时,水平旋转罗盘将磁针针头(箭头)对准“子”位(即0度),磁针针尾(箭尾)对准“午”位(即180度),使磁针与“子午线”重叠对齐,以察南北,与子午线垂直并穿过罗盘中心的卯酉线则为东西向,形成四正方位基准,以定二十四山向。在堪舆罗盘中,子午线又叫“海底线”,一般用红线或黑线画于“天池”底部。航海罗盘将子午线移到“天池”顶部,是为了在海上船舶摇晃、光线较暗的恶劣环境下,能更加直观准确地认定方向,突出航海罗盘的实用性。

航海罗盘的使用

指南针在宋代广泛运用于航海后,海船上出现了专职掌管罗盘导航的航海专业技术人员“火长”。“火长”在船上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吴自牧在其



图1 卢家炳家传航海罗盘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



图2 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航海罗盘

所著《梦梁录》中记载:“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之命所系也。”“南海1号”南宋沉船也出土了墨书“蔡火长直”的宋磁土窑酱釉罐底。一些明清文献将“火长”误作“伙长”。在海南,这类人员一般称为“火表”。

1977年5月至7月间,厦门大学学者韩振华等到海南西沙群岛、文昌、琼海等地调查访问了几十个富有经验的老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据蒙全洲、彭正楷等风帆时代的老渔民口述,“每只船有二、三个罗盘针(罗庚),装在木盒里,放在船的正中指方向,午向南,子向北。”“一条船要准备二三个罗经(用一个盒子点灯,罗盘针放其中),大工旁边要安置两个罗经(放一个罗经怕万一失灵)。船长处也有一个罗经,用以纠正大工的错误。”在海南地区的海船上,除了火表掌管罗盘,船长也需观察罗盘方向,以便及时发现纠正火表可能出现的错误。罗盘一般放置于船的纵向中轴线上。在中桅(主桅)后靠近舵把的位置设有一小小的木龛,称为“针龛”或“庚龛”。里面往住会铺上一层大米,罗盘放在大米中,以保持水平、并减少晃动。木龛样式与清代《浙江海运全案初编》中的“沙船行驶图”所绘的“针盘”相差无几。

出海航行时,火表或船长根据“更路簿”记载的“更路”,确定船舶航行方向,一些熟谙“更路”的火表或船长则无须随身携带纸本“更路簿”。卢家炳祖传《更路簿》第一条“自潭门驶出深一更巽乾十六更到七连”,“潭门”即潭门港,又称大潭、大潭门;“深”在海南方言中是远的意思;“巽乾”是针位,一般记载为“乾巽”,实际上是单针“巽”,相当于东南135度方向;“七连”即西沙群岛中的七连屿。航行方法为:把船沿潭门港礁门水道向外开出一更后,转动罗盘,使罗盘方位盘上的“巽”位对准船头,用细线压在“巽”字、罗盘中心点、“乾”字上,线的两端则固定在木龛上,与船的艏艉线平行,接着调整船头,将磁针对准“子午线”后航线就确定了,便可扬帆驶往七连屿,约十六更到达。在航行过程中,需要时刻紧盯航海罗盘磁针,并结合潮流、洋流、风向、风速等各种因素把握航向和航程。

近年来掀起的“更路簿热”,引发社会各界对“更路簿”的广泛关注。“南海航道更路经”,也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比而言,在古代先民探索海洋的征途中起着关键作用,为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坚实航行保障的航海罗盘,亟待抢救、发掘、保护和传承。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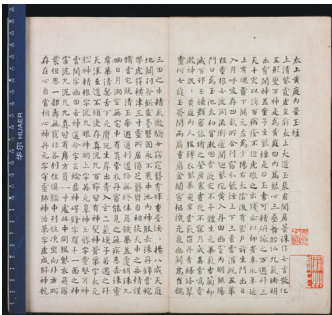


图3 何绍基《黄庭内景玉经册》

此册上有杨翰题跋:“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清浑,仍从琅琊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该跋语不仅精确道出了此册书的艺术水平及其在书坛上的历史地位,同时说明了何绍基的楷书并非简单的楷书用笔,而是创造性地用篆、分的笔意去书写楷书。

颜体楷书之所以有高成就,同样是由于颜体脱胎于篆隶,颜体的“篆籀气”正是如篆籀一样的古朴遒润而又充满张力的书法气象。颜真卿有着深厚的篆隶功力,圆浑外拓的笔致于当时亦是一大创新。何绍基的书法艺术,正是沿着颜体的脉络前行,以“横平竖直”为基本准则。早在二十岁之前,他便“初从颜清臣(颜真卿)问津”,探寻书法之道,及至晚年,他仍深情地表示“唯有平原(颜真卿)唯吾师”,足见其对颜体书法的尊崇与追随。

何绍基对颜真卿书风可谓是为极为倾心,深受感染、熏陶。何绍基广搜博取,遍临颜体各类经典碑帖,笔耕不辍,笃志不倦。观其书法作品,颜真卿书法特征跃然纸上,笔画雄浑刚劲,结构端庄开阔,气息醇厚古朴,尽显颜氏书风神韵又独具个人风貌。

【作者单位: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

湖南博物院藏何绍基书法中的颜氏书风

李函峪